

新能源汽车产业更多利好“在路上”

□ 本报记者 刘 政

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首超燃油车，政策文件提出新能源汽车2035年将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强力推动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近期喜讯频传，有望在下半年开启新一轮向上周期。

新能源车零售销量首超燃油车

8月14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以下简称“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1~11日，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27.4万辆，比去年8月同期增长57%，较上月同期增长25%。

此前，乘联会8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51.1%；常规燃油乘用车零售84万辆，新能源乘用车零售87.8万辆。这是新能源乘用车国内月度零售销量首次超过传统燃油乘用车。

值得注意的是，7月本是汽车产业传统淡季，叠加消费信心不足、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7月汽车整体产销环比、同比都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但新能源汽车仍一枝独秀。

“这一突破，是中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也是全球汽车行业绿色转型的重要里程碑。”业界人士表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是指新能源车在整体乘用车销量中的占比，渗透率的提升意味着新能源车得到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乘用车市场新能源汽车月度渗透率首次突破50%，是中国汽车工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写照。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这主要得益于我国日趋完善的汽车制造体系，特别是自主品牌创新性地发展插混技术，实现狭义插混和增程式的技术突破，中国插混占世界插混市场份额达到78%。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7月印发的《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对于纯电动和插混车等新能源汽车的补贴较传统燃油车更



近年来，重庆把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不断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加速布局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图为工人在长安汽车重庆两江工厂总装车间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高，进一步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发展。

崔东树认为，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首超燃油车，说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不断提升，购买意愿也大幅上升，带动中国汽车工业全行业向新能源汽车方向转型。

新能源车将成新销售车辆主流

回顾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历程，2020年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达500万辆；2022年2月突破1000万辆；2023年7月第2000万辆下线；到2024年6月底，国产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均超过3000万辆。

造车新势力以及部分互联网企业，凭借技术创新和灵活的市场策略，成为撬动市场的“鲶鱼”；传统车企纷纷加大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汽车下乡、减免购置税、以旧换新等政策“春风”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助力……

随着产业布局更加完善、技术不断成熟，中国新能源汽车焕发出强大的竞争力和

创新力，从“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8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推广低碳交通工具，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替代，加快淘汰老旧运输工具，推进零排放货运等。到2035年，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

业内人士认为，《意见》对于汽车产业实现绿色转型、低碳环保、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推广中，乘用车快于商用车，《意见》提出了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的电动化替代、推进零排放货运，有一定的针对性。

目前，北京、成都、深圳、杭州等城市都在大力推行城市出租车、公交车电动化。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等五部门日前印发《上海市交通领域大规模设施设备更新专项工作方案（2024—2027年）》，其中提到，计划到2027年底前，上海市公交车、出租汽车全面实现新能源化。

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示范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对外开放始终是推动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从经济特区、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开放，到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既拼“硬件” 又下“软”功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

1988年，刚到福建宁德任职的习近平同志，一边调查走访闽东九县，一边思考闽东这只“弱鸟”如何先飞？当时，闽东四个沿海县中已有宁德、霞浦两县列入开放县行列，习近平同志认为福安和福鼎也要积极争取列入开放县。“硬件”拼不过，可以加大软环境建设，下“软”功夫。

习近平同志提出，除了要坚决执行国家制定的法规、条例外，还可以针对实际情况，考虑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条例，切实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没有安全感，外商不会来，来了也会走。”在规则、规划、管理和标准等方面下功夫，此时的习近平同志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制度型开放的雏形。

到任浙江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三个千万百计”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2006年，浙江启动第四轮强县扩权试点，一次性赋予义乌县级政府百余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其中就包括外资企业及分支机构登记、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等项目，为义乌的开放解除了体制束缚，义乌踏上从贸易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变。

随着国际分工体系与价值链调整重构，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呼唤着更高水平的开放层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将制度创新摆在重要位置。

“我们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开放促进我们自身加快制度建设、法规建设，改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国际竞争力。”2017年7月，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时如是指出。

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

与此同时，多部门持续组织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取得初步成效，仅2022年到2023年，农村电动汽车的渗透率从4%上升到17%，增幅明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认为，当前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的替代效应正逐步增强，2027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处于对燃油车快速替代阶段，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将达到3000万辆。由此，到2035年，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主流的目标基本可以实现。

多重利好仍将持续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火热的背后，离不开市场、政策、技术等多重因素强力推动，而更多利好正“在路上”。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对新能源汽车消费也有一定提振作用。8月16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有关工作的通知，对符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规定，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补贴标准由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1万元、购买燃油乘用车补7000元，分别提高至2万元和1.5万元。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力度高于燃油车，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车有一定引导作用。不少地方在执行此政策的同时，还发放汽车消费券，同时汽车厂商也在配套让利，叠加多重优惠，加大对消费者换购新能源汽车的吸引力。

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多种变革性技术相融合的当下，新的市场空间已初具雏形。智能网联汽车是全球汽车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汽车、通信、交通等行业跨界融合的产物，已成为全球产业创新热点与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顺应时代潮流，汽车行业将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崔东树认为，未来，随着智能网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融入，汽车将被赋予更多可能性，扬帆远航，驶向智能化、绿色化出行。

次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此后，“制度型开放”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反复提及，并被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等重要文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强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制度型开放”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以制度创新促进营商环境改善，不断激发市场活力。近年来，我国积极推动国内规则体系与国际经贸规则有机衔接，初步搭建了外商投资准入、促进、保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框架，规范了行政执法行为，为外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以制度创新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由习近平总书记倡议设立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如今已连续举办6届，有效缓解了国际贸易投资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以制度创新推动开放创新，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改革探索。2023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主动全面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进一步加大压力测试力度，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足迹，我们能看到，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改革开放的中国，始终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风正好是扬帆时。

现代化离不开开放，开放成就现代化。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202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考察，来到黄海之滨的日照港，一番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们应当坚定一种信念，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可以成功。”

（原载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4年第7期）

《1版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提升宏观调控科学性有效性

陈彦斌表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提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陈彦斌探索性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将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这三类最重要的宏观政策纳入统一的新理论框架，在国内学界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可。不过，陈彦斌也坦言，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实际上是“多策”而不只是“三策”，究竟如何“合一”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总结和实践探索。

基于在这一领域的长期研究，陈彦斌从五个方面谈他对“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有助于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同时节省政策空间，同时提高宏观政策传导效率；有助于解决可能的协调失灵问题，将经济推向更高水平循环；有助于实现最优宏观经济结构下的短期平稳运行与长期稳定增长；有助于给微观主体确定的前瞻性指引，便于其优化决策行为，最终避免“合成谬误”；有助于加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应对国外政策的负面溢出效应。

2023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决定》再次明确“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一般而言，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等，非经济性政策主要包括政治政策、军事政策、外交政策、社会政策四大类。

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曾撰文指出，“实践表明，除了经济政策外，许多非经济性政策也对经济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要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政策统筹，在加强财政、货币等政策协调配合的同时，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今年1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高质量做好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一是健全完善评估机制，明确评估范围，完善评估流程，科学精准评估包括非经济性政策在内的政策影响。二是全面稳健评估政策效应，从严从细把关各项政策对经济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行业和区域、就业和预期等的影响。全面精准分析系列政策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强化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切实防范“合成谬误”。三是强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致性，抓好政策出台窗口期。切实强化预期管理，充分征求意见建议，合理设置政策过渡期。加强政策实施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分析研判，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等问题。

“我们应当坚定一种信念，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可以成功。”

风正好是扬帆时。

现代化离不开开放，开放成就现代化。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的伟大成就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202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山东考察，来到黄海之滨的日照港，一番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们应当坚定一种信念，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可以成功。”

（原载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4年第7期）

前仍存在国家战略融合不足，规划目标与政策工具不协同，专项规划对总体规划支撑不足，财税、金融、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国家战略、国家发展规划统筹协调不够等问题，影响国家战略和规划作用更好发挥。

《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陈彦斌在谈及学习体会时表示，构建科学系统的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不仅要求在战略层面进行深入思考和规划，还要确保这些战略能够得到有效执行。通过健全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推进机制，可以确保不同领域和层次的政策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从而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通过健全国家战略规划衔接落实机制，能够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

“这有利于将各部门、各地方的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工作重点纳入国家发展全局予以考虑和安排，有利于更好推进战略、规划、政策的统筹协调，增强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的衔接配合，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强化各类政策的保障和支撑作用，保障国家战略和规划顺利实施。”陈彦斌说。

中长期规划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分析预测室主任刘雪燕表示，长期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五年规划会对未来经济工作进行1年期和5年期的规划。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更加注重对长期（“两步走”战略首个目标的完成期，即到2035年）以及超长期（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完成期，即到2050年）目标进行科学规划，有助于有效引导和稳定公众预期，从而充分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宏观经济的战略导向作用。当前阶段，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的重点是加快落实“十四五”规划，切实做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

《决定》提出，“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陈彦斌在谈学习体会时表示，政策协同发力，不仅要求政策之间相互补充、避免冲突，还要求各项政策能够针对不同领域和问题发挥独特作用。优化增量资源配置，意味着要在经济发展中合理分配新资源，以支持关键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存量结构进行调整，有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最后，围绕如何理解“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陈彦斌给出一个学习《决定》的全局视角。他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体制机制层面为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基础性支撑，有助于提升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增长政策的实施效率；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结构政策和稳定政策的效率；有助于提升经营主体的活力，提升宏观调控的传导效率。